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二輯

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
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
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
域外漢籍研究是一片剛開始耕耘的廣袤土地，
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着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與熱情投入其中。
《集刊》願與這樣的學人共同成长。



中文社會科學論文索引 (CSCD) 來源集刊



中華書局

第十二輯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中華書局
北京 2015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2輯/張伯偉編.—北京:中華書局,
2015.11

ISBN 978-7-101-11484-3

I.域… II.張… III.漢學-研究-國外-叢刊
IV.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04000 號

-
- 書名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二輯
編者 張伯偉
責任編輯 孫文穎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規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9½ 插頁 2 字數 480 千字
- 印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1484-3
定價 138.00 元
-

南京大學985工程三期項目經費
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專項資金
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資助出版

目次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從“狗邪”到“加羅”

——對朝鮮半島南部早期歷史的思考 張學鋒(3)

唐朝的賓禮儀式及其實施考論

——以與新羅的交往爲中心 拜根興(15)

朝鮮王朝地方性的禮儀活動

——慶尚道清道郡鄉飲酒禮儀記錄 盧鳴東(31)

《高麗史節要》的編纂特點及史料價值 王霞(43)

朝鮮朱子學與《朱子大全劄疑輯補》 宋赫基(57)

朝鮮文人集杜詩研究 左江(79)

“三唐”詩人宗唐的文學史意義及其藝術局限 張景昆(107)

朝鮮申綽《詩次故》論析 付星星(129)

朝鮮女詩人金錦園的身體、文學和精神之旅 俞士玲(151)

日本漢籍研究

遣唐使的長安體驗與日本上代漢詩的轉型

——以《懷風藻》爲中心 郭雪妮(169)

稀見日本漢文小說五種述略 孫虎堂(187)

試論《春夢瑣言》爲日人假託明人所作漢文小說 徐婷育(199)

越南漢籍研究

黃德良《摘艷集》考論 劉玉璠(213)

同治八年越南一朝鮮使臣交流初論 陸小燕(237)

- 從阮德達《葫蘆詩集》看清代詩歌文獻在越南的接受 … 何仟年(255)
 中山大學藏越南典籍敘錄 …………… 陳 莉(271)

漢籍交流研究

- 原型與流變：陶淵明《擬挽歌辭三首》
 與朝鮮時代自挽詩 …………… 林濬哲 撰 林侑毅 譯(293)
 唱和與格套
 ——論中唐及日本平安時代長篇排律的兩種
 創作模式 …………… 劉 一(337)
 從日傳《史記》鈔本看《史記》新修訂本的校勘 …………… 李 由(357)
 日本藏唐鈔本《世說新書》殘卷二種新研 …………… 趙庶洋(385)
 明末清初名妓在朝鮮的傳播與受容
 ——以秦淮八艷為中心 …………… 朴英敏(393)
 新加坡《振南日報》載《南遊記》初探 …………… 李 奎(419)

書 評

- 古寫本的新串聯
 ——余欣《中古異相》、《博望鳴沙》讀後 …………… 山本孝子(431)

文獻整理

- 對《文選集注》卷九一的復原性整理(上) …………… 林曉光(439)

- 稿約 …………… (465)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從“狗邪”到“加羅”

——對朝鮮半島南部早期歷史的思考

張學鋒

一 緒言

標題所稱“加羅”，韓國和日本史學界通常用“加耶”之名。因“加耶”之名出現得較晚^①，本文探討的對象主要是公元三至六世紀朝鮮半島南部的歷史問題，因此，採用這一時期中國史籍中一以貫之的稱呼“加羅”。所謂“加羅”，指的是公元五六世紀朝鮮半島南部的一群小國，即加羅諸國^②。加羅諸國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組織，最終在百濟和新羅的蠶食下逐漸消亡。

加羅歷史的相關研究，韓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積累了豐富的成果。作為朝鮮半島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羅歷史的研究自然受到了韓國學者極大的重視。日本學者則基於長年對朝鮮半島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的傳統，加之加羅諸國與古代日本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交往關

① “加耶”的稱呼最早出現在12世紀編撰的《三國史記》和13世紀編撰的《三國遺事》。前者主要寫作“加耶”，但也有伽耶、加良、伽落、駕洛等其它寫法；後者主要寫作“伽耶”，但又有呵囉、駕洛等寫法。

② 與加羅諸國相關的記載非常稀少。“加羅”之稱最早見於高句麗《廣開土王碑》，所載事件發生在公元400年，之前的歷史文獻無徵。

係，同樣做出了不凡的業績^①。然而，作為東亞世界一員的中國，學術界對加羅諸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和探討，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雖然個別論文已有所涉及，但專文探討就筆者管見，僅曹中屏先生《駕洛國史研究與其意義》^②和王志高先生《關於朝鮮半島古國加耶與南朝交流的兩個問題》。^③兩文曹文是中國學界首篇關於加羅（曹文採用“駕洛”、“加耶”等名）歷史的專論，在梳理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敘述了加羅的歷史發展脈絡，對加耶文化的集中代表古墳文化進行了強調。曹文指出，以“三國時代”作為朝鮮上古史研究的斷代體系，與歷史的原貌不符。這一認識非常重要。然而，曹文在探討加羅歷史發展脈絡時所用的文獻史料，大多為《三國史記》、《三國遺事》、《駕洛國記》、《高麗史》等 11 世紀以後編纂的史料，這些史料追述的成分較多，因此其歷史發展的脈絡真假難辨。王文基於考古學的觀察，通過出土文物的比較，對加耶與中國南朝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進行了展望。但由於可供比較的文物資料過於稀少，王文也不得不承認“迄今發現的加羅文物中能夠確認與南朝相關者不多”，並認為這與兩國之間僅有一次外交往來的文獻記載相吻合。然而，除文物資料的類比外，基於中國現存的歷史文獻，是否可以對加羅諸國的早期歷史勾勒出一些粗線條來呢？

筆者對朝鮮半島古史的探討，始於《四五世紀東亞世界的形成與東晉南朝》一文^④。文中，筆者考察了中國秦漢以後的政治、社會變動對周邊地

① 近期的主要成果，可參見田中俊明《古代の日本と加耶》（東京：山川出版社，2013 年）所列參考文獻。

② 曹中屏：《駕洛國史研究與其意義》，《韓國研究論叢》第二十五輯（2013 年第一輯）。此外，曹中屏尚撰有《任那“官家”與朝、日關係》一文，載《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 3 期。

③ 王志高《關於朝鮮半島古國加耶與南朝交流的兩個問題》，該文曾在 2013 年 8 月 29 日～9 月 1 日韓國金海市及仁濟大學加耶文化研究所聯合舉辦的大城洞古墳博物館成立 1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部分宣講，後經增補，載《文物研究》第 21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 年 9 月。

④ 拙稿《四至五世紀東亞世界的形成與東晉南朝》，載拙著《漢唐考古與歷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3 年。初見《四—五世紀における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と東晉南朝——中國側の史料を中心として——》，載田中良之、川本芳昭編《東アジア古代國家論》，東京：すいれん舎，2006 年。

區的影響，認為秦漢文化的對外發展，促使周邊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開始踏上了初期國家的發展道路，在東亞世界的高句麗、百濟、新羅和倭國的國家形成過程中，東晉南朝的冊封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這一考察的對象主要是四五世紀的東亞世界，此時朝鮮半島上已經基本形成了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大勢力。立足于三大勢力角逐的基礎上觀察朝鮮半島古史的立場，或許可以稱之為“三國史觀”。在此後的研究中，筆者漸漸意識到，“三國史觀”往往忽視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大勢力形成之前的半島古史^①，如很多研究將五世紀末以前半島西南部馬韓地區的歷史與百濟混為一談。此外，水稻種植由北向南經高句麗傳往半島南部等觀點亦是典型事例。其實，百濟政權從漢江下游地區逐漸擴展到半島西南部的榮山江流域，到最終徹底控制半島西南部，其間經歷了好幾個世紀。那麼，在百濟勢力完全控制馬韓地區之前，榮山江流域又呈現出了一種什麼樣的歷史、文化面貌呢？筆者因此撰寫了《卑離、夫里與 buri》一文^②，以羅州紫薇山城出土陶片所見“半乃夫[里]”銘文為線索，通過對《三國志·東夷傳》中出現的馬韓地名“卑離”、《三國史記·地理志》中出現的舊百濟地名“夫里”、今泰國北部地名中的“buri”以及中國江南地區歷史上出現的“甫里”、“藩離”、“武里”等古地名語源的探討，揭示了半島古地名“卑離”、“夫里”源自百越語的可能性。該文結合光州新昌洞公元前後的聚落遺址所展現出來的炭化稻粒、水稻植硅體、木制生產工具與生活用具以及環壕聚落、干欄式建築等遺存，指出在半島進入三國時代以前，西南部榮山江流域的馬韓早期社會中存在著比較濃厚的百越文化因素，這種因素是隨著今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百越人的遷徙帶來的。那麼，與榮山江流域的馬韓諸國相比，位於其東部洛東江流域的加羅地區，其早期的歷史、文化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面貌呢？本文想對這個問題闡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① 前引曹中屏《駕洛國史研究與其意義》一文也同樣意識到了這一問題。

② 拙稿《“卑離”·“夫里” 그리고 “buri”——馬韓早期社會의 百越文化 요소 검토——》(卑離、夫里與 buri——馬韓早期社會中百越文化因素的探討之一)，載《전남지역 마한제국의 사회 성격과 백제》(全南地區馬韓諸國的社會性質與百濟)，학연문화사(學研文化社)，2014年。

二 關於“狗邪”

“加羅”有多種寫法。朝鮮古代史的基本史料《三國史記》中，主要寫作“加耶”，但也有“伽耶”、“加良”、“伽落”、“駕洛”等其它寫法。同樣作為朝鮮古代史基本史料的《三國遺事》中，主要寫作“伽耶”，但又有“呵囉”、“駕洛”等寫法。在中國史書中，《宋書》、《南齊書》、《南史》、《通典》作加羅，《梁書》作“伽羅”，《隋書》作“迦羅”。《日本書紀》作“加羅”，又作“柯羅”。《續日本紀》作“賀羅”。儘管如此，這麼多種的漢字寫法，其實都是對當地同一語音的譯寫，表現了同一語音 ka-lâ。

在以上各種表述中，存在著“加耶”(ka-ia)和“加羅”(ka-lâ 或 ka-ləu)兩類讀音。一般認為，加耶的“ia”是加羅的“lâ/ləu”去“l”後轉化而來，因為這種轉化在朝鮮語中是常見的現象^①。然而，公元三至五六世紀前後的古語中是否也存在著同樣的現象，則無法斷言。

加耶、加羅等語音，都是通過漢字的讀音表現出來的，因此，當時記錄這些語音的漢字讀音就顯得比較重要了。漢字的語音發展非常複雜，就《三國志》、《宋書》等文獻中留下的半島南部古地名而言，縱向地看，存在著上古音與中古音之別，橫向地看，則有受漢語方言影響的可能性。

後來成為加羅諸國勢力範圍的洛東江流域，最早出現在中國史籍中的地名是“狗邪國”和“狗邪韓國”，前者見於《三國志》卷三〇《東夷傳》弁辰條，後者見於同書同卷倭人條。倭人條稱，從帶方郡海行往倭國去的途中，“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東夷傳》倭人條列於韓條之後，因此，“歷韓國”的“韓”指的是“三韓”，“狗邪”位於弁韓範圍內，故稱“狗邪韓國”。其實從古漢語的行文習慣上來看，這裏的“韓”字完全沒有必要，很可能是衍字，因此據《三國志·東夷傳》弁辰條直接稱“狗邪國”即可。

《三國志》成書於公元三世紀，從漢語音韻發展的歷程上來看，正是上古語音向中古語音轉變的關鍵時期，但大部分語音都還保留著濃厚的上古音特征。基於上古音擬音的基本原則，“狗”可擬音為 ku 或 kəu。“邪”的上

^① 參照前引田中俊明著書，第3頁。

古擬音有二，一是 ia，另一是 zia，前者多用作虛詞，後者是實詞，在取字用作地名時，取實詞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狗邪的讀音更大的可能性 ku-zia 或 kəu-zia。一般認為“狗邪”就是今天的金海，金海海灣外側的巨濟(Geo-je)島似乎應該是狗邪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巨濟”與“狗邪”的讀音也非常相近。

三世紀洛東江下游出現的“狗邪國”，在六世紀成書的《宋書》、《南齊書》中消失了蹤影，代之而起的是“加羅國”。由於後世的朝鮮史料中“加羅”又寫作“加耶”，且兩者語音相近，學界一般認為“狗邪”就是“加耶”，即“加羅”。加羅的“加”字以及其它異寫“伽”、“駕”、“迦”等字，上古音擬音為 ku，進入中古以後，逐漸變成了 ka 或 k'a，與“狗”的中古音 kəu 依然相近。然而，加羅(ka-lā/ləu)與狗邪(ku-zia)之間儘管語音上比較相近，但似乎又很難相通。那麼，從“狗邪”到“加羅”這一變化的背後，是否存在著一些特殊的歷史背景呢？

三 《三國志·東夷傳》所見三韓古國名的分析

在《三國志·東夷傳》中，狗邪國被列為弁韓十二國之一。《東夷傳》在馬韓之後將辰韓、弁韓合在一起敘述，而且還在多處將應該寫成“弁韓”的地方誤成了“弁辰”。辰韓、弁韓各十二國，合計二十四國，在列記二十四國名時，在國名前加上“弁辰”二字以示區別。辰韓十二國為：已祗國、不斯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冉奚國、軍彌國、如湛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斯盧國、優由國。弁韓十二國為：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弁辰半路國、弁辰樂奴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弁辰甘路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弁辰瀆盧國。

《三國志·東夷傳》序稱：“(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公孫)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逾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這裏我們關注到“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這句話，可以推斷《三國志·東夷傳》的內容是有人遍歷東夷諸國後記錄下來的，因此所言基本可信。

在辰韓、弁韓二十四國的國名中，基本上可以分辨出兩組特色鮮明的群組來。(1)比較明確的以聲母齒音或牙音(z、s、k')字或音近字結尾的國名，有已祗國、不斯國、勤耆國、冉奚國、如湛國、州鮮國、弁辰古淳是國、弁辰狗邪國、弁辰安邪國等9國。(2)比較明確的以聲母舌音半舌音(n、l)字或音近字結尾的國名，如戶路國、斯盧國、弁辰半路國、弁辰樂奴國、弁辰甘路國、弁辰瀆盧國等6國。這兩類國名在弁韓、辰韓二十四國中佔了大多數。

其實，馬韓五十四國中，除筆者舊稿中關注的以“卑離”或與之相近讀音的漢字結尾的近10個國名外，其它國名中也存在著上述現象。其中比較明確的以聲母齒音或牙音(z、s、k')字或音近字結尾的國名有：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古誕者國、月支國、素謂乾國、支侵國、致利鞠國、感奚國、半支國、狗素國、臣雲新國、狗奚國、不斯瀆邪國、爰池國等17國；以聲母舌音半舌音(n、l)字或音近字結尾的國名有：咨離牟盧國、莫盧國、狗盧國、冉路國、駟盧國、萬盧國、捷盧國等7國。以上這三類國名在馬韓五十四國中也佔了大多數。

通過對《三國志·東夷傳》所載三韓諸國漢字國名語音的分類，可以發現以下一些特征。(1)如舊稿《“卑離”、“夫里”與“buri”》所述，“卑離”僅見於錦江以南的馬韓地區。(2)“邪”、“支”、“是”等以聲母齒音或牙音(z、s、k')字或音近字結尾的國名普遍存在於馬、弁、辰三韓，且數量眾多。(3)“盧”、“路”等以聲母舌音半舌音(n、l)字或音近字結尾的國名也見於馬、弁、辰三韓。雖然數量相對較少，但依然可以看出，其在馬韓地域所佔比例較低(約佔13%)，而在弁辰地區所佔比例相對較高(約佔25%)。

以上這三個特征說明了什麼？如果我們做一個大膽的推測，這就是，就三世紀前後朝鮮半島南部三韓地區而言，與以上三個特徵相對應的歷史現象是：

(1')如舊稿所述，帶有“卑離”語音的國名具有濃厚的百越文化因素，其主要成員是來自中國大陸東南部的百越人以及與當地土著的混血。百越人帶來了先進的稻作文化，因此，在公元前後的光州新昌洞遺址中表現出了顯著的稻作文化特征。

(2')“邪”、“支”、“是”等以聲母齒音或牙音(z、s、k')字或音近字結尾的

國名，是來自中國大陸東南的百越及來自北方的通古斯語族東胡（騎馬民族）^①文化傳入三韓地區之前已經形成的土著邑落，數量最多，廣泛分佈於三韓各地，“狗邪國”就是其中的一國，因其位於從半島渡航列島的交通要口，因此，在《三國志·東夷傳》倭人條中留下了特殊的記載。到了三世紀前後，這些邑落中應該已經雜居了部分外來人口。

(3)“盧”、“路”等以聲母舌音半舌音(n、l)字或音近字結尾的國名，其主要成員是來自中國大陸東北或半島最北部、經半島東部海岸南下的所謂“騎馬民族”，經過一兩個世紀的不斷南遷，到公元三世紀前後，已經在三韓地區尤其是東部的弁辰地區與土著錯居，並形成了自己的邑落。而這些南下的“騎馬民族”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融合了不同文化，最終形成了舊三韓地區的文化主體。

四 諸“羅”的發展

“盧”、“路”及加羅、新羅之“羅”，均是 lā、ləu 或與之相近語音的漢字標音。lā 或 ləu 音的意思，通常認為是古朝鮮語中國家(nara)的意思，雖然這個推論是站在朝鮮語和日語的歷史和現狀上做出的解釋，但基本能夠成立。不過，“國家”這個概念似乎很難用在朝鮮半島早期歷史的研究上，因為至少到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政權基本確立之前，所謂“諸國”，其實都還處於早期國家階段、是以一城一邑為中心形成的國家雛形，這種形態可以稱之為“邑落國家”，規模較小，《三國志·東夷傳》馬韓條所謂“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弁辰條所謂“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戶”，描述的就是這種狀態。因此，羅(nara)應該就是以一個較大城邑為中心形成的早期政權形態。其實，這在中國史書《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新羅條中能找到線索。傳稱：“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這當然是新羅已經基本統一半島東南部以後的情況，但不難發現，所謂“俗稱”，應該是新羅尚未受到漢語影響之

^① 這裡借用了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國家——日本古代史へのアプローチ——》（中公文庫，1984年）的概念，以示與農耕民族相對。又見江上波夫、佐原真對談錄《騎馬民族は来た!? 来ない!?》，東京：小學館，1990年。

前的自身的語音，其君主所在的最大城邑稱“健牟羅”(kiəmlā)；原屬新羅的小邑落稱“啄評”，所以被中國人理解為“內”；“邑勒”的“勒”，與“盧”、“路”、“羅”音同或音近，應該是原先獨立的、後被新羅吞併的其它邑落國家，故中國人將之理解為“外”。也就是說，到中國蕭梁時期，正像《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對百濟政權“後漸強大，兼諸小國”那樣，新羅也已吞併了數十個原弁韓和辰韓的邑落(kiəmlā 或簡稱 lā/ləu)，而位於蟾津江以東的洛東江、南江流域的五個 kiəmlā 或 ka-lā/ləu(加羅)，以“五加羅”(即“五加耶”，或稱“六加耶”)的名稱保持著相對獨立，直到六世紀被新羅和百濟徹底吞併。

據研究，五加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盟，並且力圖在新羅和百濟這兩大勢力之間保持獨立，在當時國際政治中被視為一個“加羅”。為了保持獨立，其所採取的手段之一，就是向百濟、倭學習，積極與中國南朝政權展開外交關係，希望得到南朝政府的支持。《南齊書》卷五十八《東南夷傳》加羅國條稱：“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479)，國王荷知使來獻。詔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外，奉贄東遐。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這是加羅唯一一次與中國王朝之間的往來。

然而，當時處於從早期國家向成熟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在加羅遣使南朝、受封“輔國將軍、本國王”的同時，百濟、新羅通過實際的軍事行動兼併著舊三韓諸國。倭國也在觀念上佔有這些地區，劉宋元嘉二年(425)、元嘉二十八年(451)、昇明二年(478)、蕭齊建元元年(479)，倭國三番五次上表南朝政府，要求“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雖然南朝政府認識到百濟已是強大的政權，不允許列入倭國的軍事都督範圍，但還是認可了“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用“任那”置換了“百濟”。即使在加羅遣使南朝，被授予“輔國將軍、本國王”的同時，南朝政府依然認可了倭國對加羅的都督權。這些現象說明，通觀整個五世紀，百濟、新羅雖然有了重大的發展，但包括加羅在內的舊三韓地區依然存在著一些相對獨立的小國或小國聯盟，隨著半島和列島之間的貿易往來和軍事衝突，這些小國成為倭國覬覦的對象，而中國南朝政府對其中的詳情或細節是不了解的。因此，到了五世紀末，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還保持著相對獨立，但在國家形成過程中處於相對落後的加羅、馬韓、辰韓諸小國，已經成為百濟、新羅、倭等政權的盤中餐或覬覦對象，很難再有機會擺脫被徹底吞併的命運。

五 結語

通過對“狗邪”、“加羅”這些國名語音上的分析，結合舊稿對“卑離”國名的探討，我們似乎可以描繪出朝鮮半島南部進入三國時期之前的部分面貌。

(一)史前即生息在半島南部的土著，其生產、生活的據點稱作“邪”或與“邪”音同或音近的“者”、“是”、“支”，如狗邪、安邪等。經過長期的發展，這些“邪”逐漸出現階級分化，朝著邑落國家的方向緩慢發展。

(二)從公元前五六世紀開始，隨著中國大陸東南部的吳越爭戰、楚滅越等政治、社會變動，百越人開始向海外遷徙。隨著百越人的遷徙，在東亞世界範圍內，稻作及其相關的生產工具、居住形態、社會習俗等跡象開始出現在朝鮮半島西南部和日本列島的九州。秦統一中國後，大陸東南部的越人掀起了更大規模的遷徙，稻作文化在半島西南部和九州等地呈現出了快速的發展，公元前後的光州新昌洞遺址、佐賀吉野里遺址是最具代表性的遺址。出現在中國文獻中的“徐福東渡”故事，與其說是“徐福”一個人與五百童男童女的故事，毋寧說是長達幾個世紀大陸沿海居民向半島、列島遷徙的一個縮影。百越人在半島西南部登陸後，帶來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和語言習慣，出現了被稱作“卑離”的邑落。百越人與當地土著通婚，並逐漸往東滲入土著人的邑落“邪”，由此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統一的區域名稱“馬韓”。由於先進的稻作農業在當時經濟上有著絕對的優勢，因此，馬韓社會的發達程度西部高於東部。

(三)公元前後，隨著東北亞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加之王莽民族政策的失敗，東北亞民族的覺醒非常醒目，烏丸、鮮卑、挹婁、沃沮、獺、貊等族群登上歷史舞台，高句麗崛起，扶餘南遷等等，原屬通古斯語族的“東胡”族群（騎馬民族）開始大規模進入半島，並進而進入列島。由於半島西北部有漢朝的樂浪郡，因此，沿半島東部南下成了他們遷徙的主要途徑。南下的族群進入半島南部後，先於他們已經在此定居的土著和百越後裔（馬韓）接納了他們，並讓他們在半島東南部定居了下來，因此《三國志·東夷傳》稱“辰